

王式昌 王景涛 主编

面对时代的选择

探索中的新时期文学

面对时代的选择

——探索中的新时期文学

王式昌 王景涛 主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20,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印数: 1—5,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一心

责任校对: 纪 宇

封面设计: 孙 明

ISBN 7-5382-0432-6/I·23

定价: 2.40 元

文学进步与批评期待

——序《面对时代的选择》

谢冕

这是中国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关键的一个时刻，尽管意识并把握这个时刻已显得晚了。——谁都知道二十世纪已近尾声，我们显然不能完整地失去这整整决定地球命运显得残酷却又无比辉煌的一百年。中国这个时期的文学精神，它的亢奋、它的隐忧、它的困扰，无不来源于这个世纪的动荡与病变。当前阶段文学的思考已潜深刻并接近于上述那个磁心。它把中国人冬眠醒来的灵魂的困惑和迷惘，以及这个灵魂面对旧世纪的落叶和可见未来的更为严峻的抗争，都快速地浓缩在已经过去的匆匆十年的创作实践中。

在全民、全社会的历史反思中，文学是神经最敏感，实践最大胆，因此，成效也最卓越的一个部门。文学的反思始于文学自身久经劫难的失落。对曾经发生的那一切，或带着血泪的控诉，或充溢着激情的批判，终于以血淋淋的再现而促进了人们对变态人生的认识。但文学的反思显然只是以此为起点，它迅即进行了由社会政治的表层而转向人的自身。文学触及由人的被摧残、被蹂躏以及它的不知不觉的被异化，直到与哲学思考的自然契合，即对于生命本体的探询与叩问，从而在文学的新近追求中，拓出了一个新生面。

中国这十年的文学变革，由于特殊的际遇，它自然而然充当了对于社会进步和纷扰的说明和解释。社会有多么繁复，文学也

有多么繁复。文学的急匆匆的步子甚至走在了社会能够意识到的前方。文学观念和文学意识的急迅的嬗变，它的多样形态的自由创新和全面的展示，几乎就是中国社会情势和性格的文学化体现。

文学冒着各种可能的危险，谨慎而又勇敢地走在变革旧传统和创造新意识的前面。如同中国社会，它自身既承受着历史因袭的重负，却又面对新世纪迈出了对未来充满疑惧又充满憧憬的步子。正因为是如此负重的行进和开拓，因而来自环境和自身的阻挠便十分严酷。这一路的行进中，上帝的召唤和魔鬼的诱惑始终成为两极的引力，使文学充满了困苦和悲哀。中国文学因为敏锐的对于时代氛围的感应而具有的超前品格，使它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但毕竟用血泪造出了如今令人且忧且喜且不失其为辉煌的局面。它既体现对于新文学传统的修复和光大，又向着世界性的文学新潮空前地逼近和加入，从而使中国有可能和现代世界的文学沟通并平等地对话。

我们诚然无须对当前文学的发展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在通往成为伟大文学的路上，它不过是一个大幕拉开之前的前奏曲。但它毕竟激动人心。这个激动人心也是悲乐掺半的：一方面人们感到毕竟开始了的欣慰，一方面又感到了这个开端原应大大地提前。我们之所以认为不必过于乐观，是由于迄今为止我们的大量工作只是用来扭转文学走过的歧路，以及磨炼那一支支锈迹斑斑和疑虑重重的笔。我们从期待赐予的自由到终于承认自由即在自身，这一认识的获得花费了相当多的时光。中国文学开始直立地蹒跚行走而不再需要拐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年由于文学内在规律的约束而发生的日新月异的艺术变革。它以令人目眩的急迅的旋转带来普遍的兴奋，也给一些忧心忡忡者带来不安。中国文学从来也没有如同现在这样充满了活力和生机，而且伴随这些变革的是探索的勇气和

试验的信心。成效即目可见。缺憾与不足自是难免，但作为探索前进的伴生物，却是一种自然而然。

文学的这些重大发展带来了消费者的惬意。因为文学的货架已结束了过去的不可挑选，现今则是各式各样的读者都可以在任意选择中得到满足。同时也给研究者带来困惑。因为对它的认识和描写越来越困难。伴随着文学之巨变而来的，是批评界第一次感到了被动和无所适从。传统的批评方式与传统的文学生态相联系。在以往，批评站在高处，而文学现象则是相对的静止，批评可以自在地把握并驾驭它的对象。对象的不变减轻了批评的负担。

这局面如今已告结束。批评面对的是一条又一条满身滑溜的游鱼。批评第一次感到了自身的不灵便，以及“网眼”过于稀疏——它逮不住那些游鱼。首先是观念的歧异所产生的痛苦，而观念又是由众多的“异端”所构成。这种对于“异端”的适应，是最难迈出的一步。更何况在这个大变动的时期，人们认识的不稳定是突出而普遍的现象。因而更大的困难还在于观念本身是动态的不稳定。批评方法的不能适应，主要原因是由于传统方式的过于狭隘和单调。以不变的批评视角、批评方式和批评语言来对付如今这些“不安分”的文学精灵，其难度自然是很大的。

十年中文学批评所建树的功勋人所共识。要是没有文学批评在艰难时刻的呐喊和助威，文学创作要冲破那些久远的人为的禁锢，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样，我们的文学很可能还要在黑暗中作长久的忍受。因而，在文学的伟绩中，批评占有的位置不可遗忘。但现阶段文学批评的确遇到了困难。它的被动状态是明显的，然而这种被动也并非不可扭转。目前小说批评的兴起，便是明证。诗歌批评曾经以它的敏锐反应而引起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它对于引起新追求的重视有着显著的作用。诗歌理论试图把握实践，曾产生积极的效果。近期诗歌批评则逐渐沉寂，热闹却让位于小说批评了。诗歌批评理论准备的薄弱是明显的。

文学的发展期待文学批评者甚殷，这也并非要求批评家一味地追赶文学的急变，以及应合那些旨在炫新的时髦。批评家作为一个主体，他可以而且应该充当一个积极而自立的角色。批评的自我追求无可厚非，如同文学不必听从别人的指挥，批评也可以自以为是的进行。批评家理应有他一份自由：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位置和批评的方式，以及自由地运用自己的语言。当然，批评家也要使自己与时代的进步相谐调。为此批评家的自我补给与自我更新则是必要的。

从总的批评格局看，文学批评的定势发展，曾经带来局限。面对文学的巨大变革，这一变革期待文学批评的有效配合。为此，文学批评便要消除以往的局限——例如，以非文学的社会性运动对文学实行阶段性划分、以及满足于以作家论的格式作单个的背景材料的考察，以及忽视各个文学现象的交叉关联等。对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综合和归纳，并对充满活力的文学作出非静止的考察，深入艺术的内在律动而对整个阶段乃至整个时代作宏观的描写、判断和预测——当然，这一切又需以对于个别的深入细致的微观把握作为基础，这些微观审视是整座巨大建筑的可靠的基石——有恢宏的气势而不空泛，有切实的剖析而不琐屑，这是我们所热切期待的批评。

文学的历史总结和历史描写，建立在平时开展的文学批评活动基础上。与历史的呈现相随的是无情的淘汰。无淘汰也就无历史。为了保留历史对某一现象的判断，它必须以千百倍的剔除作为代价。从这个事实出发，我们坚持作为批评实质的选择的品格。批评家面对浩如烟海的当代文学作品，他的第一步工作是选择：从无数平凡中发现才华和智慧；从无数一般中发现特殊的品质；并有信心通过琐碎的现象进行卓有成效的大胆概括。大量的阅读并不意味着大量的储存，甚而更意味着大量的舍弃。但要点却在于大量阅读。

中国文学最近十年的发展已引起广泛的注意。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已从已往一般泛泛的“汉学”发展为对于特定的部类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而且兴趣的中心也已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转到了新时期文学。在这方面，国外的华人或非华人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卓有建树。这从另一方面给了我们以催促。作为本土的批评界，我们理应占领一个领先的位置。这种占领并非虚荣，而是一种必须和责任。就目前的状况，我们同样的不满足，甚至同样地不乐观。

基于这种考虑，我乐于借《面对时代的选择》一书的出版发表上述一些见解。这些见解显然是由于文学的空前进步而感到批评的某种不适应而发，却也是一种期待的表述。辽宁电大以有限的条件而进行的这项工作，表现了建设批评的自觉。它的作者的阵容年青而富生气，这给人以欣慰。

此书作品我粗略读过部分，质量的判断有待于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但建设的热情却处处可以感受到。本书作者的选题适当，能够集中扼要地展示当前文学的面貌。就我读到的便有不少精采的笔墨，如《在历史和现实的广阔背景上》描述现阶段文学感到的“一种辉煌时代前夜特有的光晕”，“在这种光晕中，人们已经感到应接不暇，感到科学选择、逻辑概括的困难”，是一种对于特殊文学氛围的准确把握。论张贤亮小说《未完成的探索》，不同于经常读到的那类人云亦云的或浅尝即止的研究，而以深刻的性格剖示和在有成就的作家面前直言不讳的批评风格给人以深刻印象。如对该作品的主要人物的性格分析——“性格总被理性肢解，裂痕始终存在。在生动的变形面前，理性显出了自己的僵硬”。该文对“苦难的合理化”，以及基督的原罪意识的论点，显示了对问题思考的深入。

中央和各级电视大学是近年教育界兴起的一支巨大的生力军。它们拥有一批新的教学和科研的力量，这批力量年青而有生

气。在文学批评的领域，近年也迈出了大的步子。以有限的条件而作出有价值的贡献，如辽宁电大的朋友们那样，自然带给我们以信心。这篇序文没有对他们的著作直接发表太多的意见，但笔者基于文学的进步而来的对于批评的期待的一番议论，显然是因他们的工作而引发的。

一九八七年岁暮于燕园

目 录

文学进步与批评期待

——序《面对时代的选择》……………谢 冕 (1)

在历史和现实的广阔背景上

——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描述……………王景涛 (1)

叛逆传统、寻找光明的诗歌之流

——论新诗潮……………孙忠侠 张从容 (16)

对农民灵魂的深切关注

——高晓声笔下的农民形象塑造……姜桂亮 何宝胜 (33)

面对时代的选择

——王蒙新时期小说的艺术创新……………郑 智 (46)

京东天光与运河波影的交融

——刘绍棠及其新“乡土文学”……………初 旭 (61)

未完成的探索

——张贤亮小说创作的内在矛盾……………杨茂义 (86)

知识女性的困惑与寻求

——女性文学在新时期十年中……………赵 玫 (101)

痛苦的理想主义

——张洁小说的精神追求……………杨茂义 (117)

在沉吟中升起进取的风帆

——张抗抗近年小说创作的审美走向……………孟繁华 (131)

多种文化意识的选择

——青年作家的美学追求……………屈 选(146)

摹写民族的生力与血统

——张承志小说印象……………王景涛(162)

于朴讷淡泊中思度民族文化的命运

——阿城小说初论……………郭银星(174)

在传统堤岸与现代潮流间创造自己的世界

——莫言小说“写意”散论……………朱向前(191)

寂寞世界里的躁动灵魂

——刘索拉小说的感情天地……………巴 军(206)

漫不经心中的倜傥风流

——马原小说评析……………许振强(219)

文学领域的“丑小鸭”

——新时期报告文学概述……………聂德彬(234)

后记……………(244)

在历史和现实的广阔背景上

——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描述

王景涛

历史的变革，思想的解放，社会心理结构的不断调整，价值观的日趋多样，使得新时期文学呈现出多彩多姿、气象万千的艺术图象。人们欣喜地看到，文学世界的版图在拓展，文学家族的成员在扩大，一个开放的、富有生命力和新气魄的文学格局正在形成；在历史和现实的广阔背景上，文学张开了自由飞翔的翅膀，开始以不懈的热情向世界宣示自己的本质力量，以坚实的努力不断超越自己。中国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又呈现出了一种辉煌时代前夜特有的光晕。

在这种光晕中，人们已经感到应接不暇，感到科学选择、逻辑概括的困难——即便深知任何选择都是一种遗漏、任何概括都意味着一种牺牲的道理，在这种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面前，人们还是感到一种无从说起也说不尽的困难。然而，文学毕竟不是无所依傍、横空出世的神雾，它毕竟超越不了时代，也无法摆脱历史的巨大牵制力。正是从这里，才透出了美文可论、文学发展可以描述的一线光明。披开新时期文学表层骚动喧哗的现象，不难透视其深层潜隐的律动：作为民族社会的思想和情感的历史，新时期文学负载了历史悲剧的沉重和民族灵魂的痛苦，充满了民族深沉的自我审视和对自由富强的现代化世界的渴望；十年文学的

风雨途程，正是我们民族摆脱因循的历史重负向现代化社会迈进的心灵轨迹。应该看到的是，这一倾向渗透在创作实践中，具有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不同形态和特点。这不是文学思想断片的连接，而是一个庞杂又见出整一性的社会思想体系运行在文学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必然结果。

一、起步：生命意识的觉醒 自我旗帜的张扬

历史，在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运动中颠簸前进，这是自然法则。文学史，也总是在伴随着这种总体的历史运动扬弃更新，激荡前行。十年劫难，最沉痛的恶果莫过于对人类个体生存价值的泯灭。在疯狂的年月里，人被异化为一纸教义，蜕变为只带有残缺不全的族类群体特征的存在，这就必然导致“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内涵的空疏、干瘪。事实上，文学作为有机体，在十年的文化革命中，除了无限膨胀的阶级斗争内容而外，只剩下了“瞒和骗”的躯壳。文学已不是洞察时代、返观自身的镜子，而成为人们精神的负担，成为心灵的十字架。这样，新时期文学要发展，要反映时代和人民的情绪和要求，就必然地从对畸形时代的畸形文学的反拨（关于“反拨”说，请参阅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有关部分）起步，赋予文学以真正的使命、真正的价值。和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反拨运动一样，新时期文学对过去时代文学的反拨也经历了由简单到深入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也是短暂的，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始至一九八〇年前后“朦胧诗”群的崛起，大体经过了三年的时间。新时期文学起步期的反拨运动并没有表现为普泛、零乱地纠正和批判，也没有所谓“向后看”的重温旧梦，而表现为有秩序、有主体的思想发展过程，即经过了生命意识的觉醒到个性自我旗帜张扬的过程。不妨说，

这正是文学得以回到文学本位的过程，独抒性灵，吐纳真诚，这是文学灵魂带着荒野的风尘和岁月印痕开始的悲壮复归、发展的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标明的时间并没有绝对的意义，它仅仅是一个“大体”的笼统标志。因为思想的孕育、发生并不是某一天早上的事情，在任何条件下，它都是流动的，文学史本身就是一条河流，外在分段意义上的时间标志，都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上面所讲起步期的“反拨”，在时间上也带有同样的性质，只不过，在大体上的这段时间里，文学开始了某种独立意义上的正常发展，开始致力于一种建设，进而埋头于自负地发展、创造。

粉碎“四人帮”后，覆盖在文学天空上的沉重阴霾并没有立刻消散，戴在文学头上的镣铐也没有完全解除，“抓纲治国”的政治气氛使文学领域充满着硝烟，一些作家还带着教徒式的虔诚而保持着参加圣战的姿态。这是必然的。历史没有截然分开的两个时期，而其运行中发生震动的巨大冲击波往往不容许人们站稳脚根，不容许人们有喘息的机会。但现实是：一个畸形的时代正在死去，一个新的时代已经诞生。文学，以其特有的敏锐性传达出了这种死亡与新生的最初信息。首先是在怀念领袖及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功伟绩的作品中，流露出了文学从神学到人学的转机，出现了李瑛的《一月的哀思》、白桦的《曙光》等优秀作品。诗歌《一月的哀思》抒写了一九七六年一月中国愁凝大地哀声遍野的现实，表现了亿万人民对周恩来总理无比崇敬和怀念的心情，言真意厚，力透寒冬，一扫当代文学颂歌空泛造作的浮浪之气，也少诗人以往创作的人工雕琢之痕，堪为绝唱；其真诚、朴实、生动象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文坛，吹进了千万读者的心。话剧《曙光》正面表现了贺龙同志叱咤风云、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生活中的元帅第一次正面出现在舞台上，其举手投足，音容笑貌固然很大程度上还存在模式化、公式化的影象，但仍不

乏开创性的意义。本来，在五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在整个当代文学中是成绩斐然的领域，出现过《红日》、《保卫延安》等洋溢着英雄主义气息的优秀作品，但这个繁荣期并不长久，随着历史的逆转和历史主义原则的颠倒，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现实主义英雄主义传统渐渐让位给夸张和粉饰的虚假浪漫主义，而除了这种浪漫之果的八大样板戏，这一领域已别无他物。所以，《曙光》开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之先河，并作以最大限度的现实主义展现，这就远远超过了作品的本体意义而成为思想解放的先声。这是文学开始解冻的信号。

如果说这批作品给文坛带来了春的生机，那么它还只能算作新时期文学舞台帷幔拉开之前的序幕，直到刘心武的《班主任》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呼喊之后，我们才看清新时期文学布满“伤痕”的内幕和痛苦忧愤的远景。文学开始正视苦难，开始抒写普通人的血泪，开始表现一幅幅在畸形时代辗转过活的人生图画，开始注进真诚的血液，充满灵魂的叫喊。《班主任》对以宋宝琦、谢惠敏为代表的一代人心灵扭曲的展示令人百感交集，痛不忍睹，作品引人深思的并不仅仅是对这种病态现象的披著，而更在于作品是站在挽救生命、振兴民族的基点上所表现出的忧愤深广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继刘心武《班主任》之后，出现了大批展示生命不幸和精神痛苦的作品，这些作品“以毫无假借的真率，将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见《西方文论选》下册377页）。卢新华的《伤痕》通过母女两代人的命运遭遇反映了反动的“血统论”在十年浩劫中取代一切历史法则和伦理道德原则戕害生命的历史真实，让人联想到两千年前浩浩黄土上演出“株连九族”的血腥惨剧。郑义的《枫》惊心动魄地表现了在一个狂热时代里年轻生命的演化过程，一种极度压抑的悲剧感占

据了作者的心头。它让人们再次看到生命体内原始的无知、野蛮如何吞噬了善良和纯真！宗璞《弦上的梦》、雷抒雁《小草在歌唱》、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方之的《内奸》等作品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再现了一个践踏生命时代的种种荒谬，表现了浓重的哀伤和忧愤，也流露出不同程度的困惑。美与丑的颠倒，黑与白的混淆，促使人们对历史的无常产生了追根究底的探问，但历史的复杂又常常遮住了他们探问根源的路径，时代条件的局限使他们只能困迷在悲剧感中而不能自救。内心的痛苦是掩饰不住的，他们再也不想欺骗自己，生命本能的要求使他们讲出了胸中的郁闷，在文学这面窗口，他们开始了面对宇宙、人生、自我的交流。研究者们把这些文学作品统称为“伤痕文学”。应该说，这仅仅是一个归类而非审美品格的概括，实际上，“伤痕”下面积存的是生命悲剧的痛苦，对这种悲剧意味的咀嚼、体认则标志了主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可以说，这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自然又深刻的起点，也是对文革十年以至于更远的视人为物的荒唐文学的一次有力拨正。

文学的社会意向是丰富的，层叠交错的，各种意向往往相伴而生，互为应诺。生命意识的觉醒引发了生命痛苦的灵与性的叫喊，但它并不仅仅停留在悲剧的层次上，生命本体的痛苦，对历史无常的困惑，并不能阻碍他们对至真至美的人性的歌赞。悲剧唤起了乐观坚定的人生信念。新时期文学在这里，表现出了深刻的生命意识。女作家张洁以充满童稚天真、温和平静的笔调写出了《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那具有森林一样品格的舒展蓬勃的琴音给文坛带来了清新纯净的空气；青年作家孔捷生的小说《因为有了她》谱写了一首爱情小夜曲，充满了对生命的礼赞，对生活的向往；从维熙的“大墙”系列作品以无限的深情表现了生命的不朽和灵魂在茫茫黑夜里的闪光，令人感奋，催人自新。更为突出的是刘绍棠，艰难时世使他更深刻地体味到乡土的温情、人

民的友善，更深刻地意识到自我生命和运河母体的不可分离的关系。他的笔离开了他青年时代徜徉往返的校园而到广阔的运河两岸追溯滋乳了他生命的源泉。《蒲柳人家》、《瓜棚柳巷》中铿锵作响的人生和淳厚的京东风光交织在一起，给人以无限向往。刘绍棠的洋溢着生命力的乡土文学给文坛增添了质朴、崇高的浪漫情调。

这种积极昂扬的人生格调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生命得以解放的热情，四处迸射的思想火花和强烈的生活渴望攫住了每一位饱经忧患、从痛苦中归来的诗人。步入新时期，一批中青年诗人经过短暂生命痛苦的低诉之后，唱出了凤凰更生后悲壮、雄浑的声音。“假如生活重新开头/我的旅伴，我的朋友/还是迎着朝阳出发/把长长的身影留在背后/愉快地回头挥一挥手。”（邵燕祥《假如生活重新开头》）

“且让我/把昨日的梦幻/全丢弃在海滩上/同时，拣起一只螺号/对着太阳/把未来吹响。”（刘祖慈《夜雨过去了》）如果说以邵燕祥和刘祖慈为代表的这种含笑的告别和确认未来的达观表现出积极昂扬的生命意识，那么，以赵恺为代表的对于苦难的宽容，对青春殉难的宽容则将生命意识深化到哲学的高度，更为鲜明的理性精神照亮了生命：“我爱我逝去的二十二年/珍惜，但并不惋惜/世上有谁比我更幸运/我有幸参加了一场民族的悲剧/五十万演员/四分之一个世纪/一个延续了两千年的主题。”（赵恺《我爱》）苦难之花孕育了智慧之果，没有谁比他们更知生命的内涵，更懂得爱，更珍惜爱。

起步期的文学接纳了生命体各自的不幸，也凸出了历史对不幸的各自不同的代偿。生命意识的觉醒、社会思想解放的潮流推动了一代年轻人崭新的人生信仰和美学理想的崛起。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群年轻的“朦胧诗”人们升起了个性自我的旗帜，把生命意识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境界。和中老年诗人们不同，面对苦难，他们绝少宽容的神色，面对丑恶，他们

绝少温文的态度，面对惨淡脆弱的人生，他们绝少激昂慷慨的冲动，他们有的是暴风雨一样的诅咒，雷霆一样的愤怒和冰霜一样的严峻。他们来自特殊的历史结构，因而也具有特殊的诗风，正如评论家谢冕所指出的那样：“一个让人猝不及防的变态时代，颠倒了由革命胜利而建立起来的生活秩序。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这场空前的动乱中蒙受了耻辱和灾难。在浓重的失落感中萌发出来的追求与寻找，既使这些诗篇蒙上一片迷惘与感伤的情调，又浸透着不甘湮没与泯灭的内在力的冲击与奔突。”（谢冕《历史将证明价值》，见《朦胧诗选》序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这正是他们思维个性的自白。这样看来，“朦胧诗”并不朦胧难解，也非晦涩无情感逻辑，他们的诗也许怪相林立但并不错杂混乱，思想也许复杂但不模糊不清，一切都是“一代人”性格的体现，都是必然。全部的社会教育和自我体验只给了他们思索世界的火把，孕育了他们勇于抗争、叛逆的性格。以往传统、直白、单纯时间艺术的诗的语言框架已很难负载这些棱角分明、内涵丰富的思想，相反，这种思维的品性倒过多地与三十年代戴望舒、陈梦家们的“现代诗”形式产生大幅度的契合，细腻的感觉，跳跃的意象，组成了多层多角的诗的空间。而这一切，都以个性自我为依托而支撑起来。自我，是他们诗中极力张扬的内容，也是他们“集群”的中介。无论是北岛“走向冬天”的冷峻和迷惘还是江河历史的凝重，也无论是顾城童话般幻想的晶莹还是杨炼思想的飘逸，都透出了他们心灵里坚实的“自我”质地。他们不可能在自我的旗帜上任意胡涂乱抹，因为那无异于对自我的嘲笑。独异的心理及审美意识使他们躲开了任何直接的对“自我”的回答。

“自我”的形象在他们对社会、自然、人生的吟咏思考中映现出来。没有任何一句对世界的“回答”比北岛的这一声更响，更有个性：“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没有任何